

光荣 记忆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
亲历记



精兵之路

解放军出版社

光荣记忆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
亲历记

6

精兵之路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兵之路/《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编委会编.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

ISBN 978—7—5065—5449—7

I. 精… II. 光… III.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IV. E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6832 号

书 名: 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精兵之路卷

作 者: 解放军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郭 莹

装帧设计: 十亩·蔡天富

责任校对: 焦金仓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0 毫米×230 毫米 1/16

字 数: 470 千字

印 张: 29.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5449—7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出版说明

为帮助广大读者熟悉我军的辉煌历史,继承发扬胡锦涛主席高度概括的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我社编辑出版了这套《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丛书。

本书按照我军历史进程分六卷,每一卷以该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干,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我军高级将领等 300 余位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中精选权威章节,以高层决策者宏观叙述为主、基层一线指战员微观叙述为辅,并配以提纲挈领的导语和相关图片,力求做到历史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叙述生动,内容真实。

在编选中,我们本着忠于历史、忠于原创的原则,只作篇章上的删减,基本不作内容上的改动。由于亲历者回忆录以个人实践活动为主线叙述,一些本该详述的军史重大事件未选到合适史料,只能留待以后新的史料弥补。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我军许多高级将领的大力支持。有的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新稿件,如记录“神舟六号”升空、驻军香港、九八抗洪、海军舰艇编队环球航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俄联合军演等内容的篇章都是首次公开发表,从而使这套丛书成为比较完整而权威的我军八十年征程亲历记。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首长和有关部门、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和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拨乱反正	1
正本清源	3
落实干部政策	14
1978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17
开创新局面	21
“801”会议	23
从严治军	28
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	31
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36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46
改革军事训练	55
“蓝军司令”	60
金星闪耀	64
华北大演习	71
“802”会议	73
炮声隆隆扬军威	80
反突击实兵演习中的坦克师	85
百万大裁军	89
军队要“消肿”	91

艰巨的“消肿”之举	96
撤销铁道兵	101
南京、福州两大军区合并	109
“成昆之变”	116
军队院校建设	125
改革和发展中的军队院校教育	127
军事人才的摇篮	153
利剑在手	175
装备整顿	177
倚天铸剑	193
武器装备取得突破性进展	195
神舟、神舟	214
承前启后的重大跨越	229
歼十出鞘 锋寒万里	253
勇立新军事变革潮头	257
确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259
全军掀起军事训练改革热潮	263
开展科技大练兵活动	272
驻军港澳	293
进驻香港	295
回归	302
威武文明之师进驻香港	307
进驻澳门	313
情系人民	319
引滦入津 千秋永志	321
大兴安岭扑火战斗	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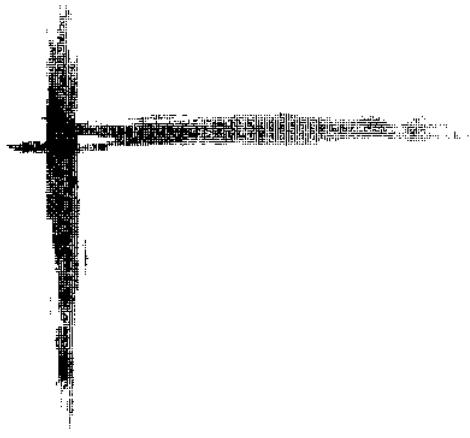
众志成城战洪魔	346
扬帆远航	357
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出访南亚三国	359
“郑和”舰出访美国夏威夷	367
环球航行：一次难忘的航程	378
维和行动	395
世界和平的卫士 中外友谊的使者	397
以中国的名义维护世界和平	407
难忘在利比里亚的维和经历	413
在黎巴嫩执行扫雷任务	419
战斗在枪林弹雨的“中国半岛”	421
紧急后送	424
我在苏丹维和的日子	428
以和平的名义	433
“和平使命—2005”——回顾中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	435

拨乱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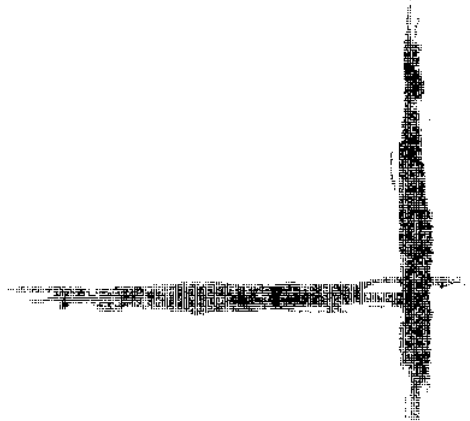
蜿蜒驰车入云端，
万夫莫破一夫关。
遥想葬身奥匈处，
溃逃败师在眼前。

英雄碑、刺破天，
瑞云缭绕紫气鲜。
奇峰叠翠映苍海，
岂容烟尘漫河山。

——张爱萍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军随即开展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组织上的清理整顿,平反冤假错案,医治“文化大革命”给军队造成的创伤等工作,使全军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组织基础。



■ 正本清源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梁必业回忆：

粉碎“四人帮”前，1976年9月29日晚，我因事去西山见叶帅。叶帅讲，他准备10月1日国庆节上天安门与华国锋同志谈一次话，总政机关要注意保持部队的稳定。

10月7日凌晨3点钟，我接到电话，说“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要我赶快到玉泉山去。赶到玉泉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刚开完，军委决定由杨成武同志和我安排军队系统传达会议精神的有关事宜。我们迅速确定参加会议人员，选定会场，使会议及时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精神，通报了“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求做好稳定部队的工作，引导部队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待中央作出部署后，迅速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10月18日，党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宣布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中央政治局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21日，公开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军指战员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策，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接着，全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连续进行了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

从1976年的12月到1977年的9月，党中央先后下发了24号、10号、37号文件，同时印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

之一、之二、之三。全军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就是按照中央3个文件的精神，依据“四人帮”3个罪证材料进行的。中央这3个文件，每个文件下发后，总政都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通知，以指导部队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一战役，着重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行，使干部战士认清“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要害是篡党夺权。第二战役，着重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恶历史，使干部战士了解“四人帮”的反革命历史，认清他们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第三战役，着重揭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使干部战士认清消除“四人帮”的影响是一场非常艰巨的斗争。通过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全军部队对“四人帮”的罪行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为后来进一步联系军队建设实际消除“四人帮”的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总政要求各单位建立清查办公室，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中央关于既要搞清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首先查清“四人帮”及其余党插手军队，进行反军乱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大事件，进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最后定案作组织



人民解放军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定

处理,以纯洁和巩固部队。

为了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清查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主持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军清查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搞好清查工作的有关指示,联系军队实际对清查工作作了部署。我在会上对整个清查工作提出要求,着重强调两点:一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查清楚;二是对人与事的处理要慎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政策办事。考虑到清查工作量大、政策性强,且又处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我不仅提出一般的要求,而且还同与会同志一起,研究拟定了《清查工作 12 条》,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清查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方针政策、实施步骤及其他有关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这个文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军委要求全军贯彻执行。全军清查工作会议之后,各单位排除阻力,打开局面,使清查工作很快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起来。

全军清查工作大致进行了半年时间,党的“十一大”召开,党中央发出了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指示,对清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总政治部于 9 月 15 日至 24 日,又一次召开了全军揭批“四人帮”清查工作座谈会。目的在于分析形势,交流经验,找出问题,以中央指示精神为指导,研究进一步抓紧抓好清查工作和政策问题。会议期间,我把全军清查工作情况和此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向就任不久的韦国清总政治部主任作了汇报,请他在会上作了指示。我就进一步做好清查工作的几个问题讲了话。

从会议反映的情况看,各级党委对清查工作重视,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和中央的方针,使清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些重点人和重点事基本明确,发展也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针对问题,会议在综合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明确了 5 个方面的问题:(一)清查工作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纯洁部队、加强部队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二)认真贯彻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三)明确了对问题严重、态度不好的人员采取组织措施的有关问题。(四)加强内查外调,进一步做好材料工作。(五)继续加强党委对清查工作的领导。此次全军揭批“四人帮”清查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由总政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将会议纪要作为 12 号文件转发全军,对进一步做好清查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雷锋班”与全连战士揭批“四人帮”

到1978年5月,全军清查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各单位对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大多数已基本查清。按照军委的要求,清查工作基本结束的单位,除对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继续查清外,要把主要精力逐步转到结论处理工作上来。这是清查工作的最后环节,也是反映党的政策能否贯彻落实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对如何做好结论处理工作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以指导全军是十分必要的。根据韦国清主任的指示精神,经总政党委决定,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的结论处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经军委批准后,作为14号文件转发全军。文件内容有6条:(一)重申了党中央对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的结论处理的政策和规定。(二)对于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根据情节轻重或错误事实,划分为“四人帮”的死党、“四人帮”的骨干分子、犯政治错误、说错话做错事四种人,并对四种人各自的定性标准作了说明。(三)规定了对四种人的处理原则。(四)强调了搞好结论、定案处理的材料工作。(五)规定了定案、结论处理的批准权限。(六)提出了关于清查出的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处理意见。这个文件,保证了全军清查工作善始善终的完成。

“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右”中,总政是个“重灾区”。特别是张春桥任总政主任期间,在总政进行了一系列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鉴于总政的情

况比较复杂,经军委批准,总政的“揭、批、查”工作是以党委扩大会议的形式进行的,按照分工,我主持了会议。在叶帅和小平同志的关怀、领导下,总政的“揭、批、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对于遇到的阻力和干扰,我曾专门向军委常委作了汇报,听取指示,得到了军委领导同志的支持。之后,我们又继续做工作,既坚持原则,查清问题,又要耐心做工作,从宽给出路,保证了这项工作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要求进行。叶帅和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总政揭批“四人帮”的成绩。总政的“揭、批、查”工作顺利结束。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在这之前,小平同志指示总政起草一个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文件。我同机关的同志一起,研究拟定了一个《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意见》。提出了5条标准:(一)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查清了。(二)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三)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传统作风初步恢复了。(四)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五)部队纪律严格了。要求团以上单位根据5条标准对照检查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重点是(一)、(二)两条,其余3条某些方面做得不够的,可以在经常工作中结合整顿,继续解决。这个《意见》经军委批准后,作为42号文件转发全军执行。到1978年底,全军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

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震回忆:

粉碎“四人帮”后,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我和总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必须坚决按照中央的部署,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精心指导。

“四人帮”横行时,对总后多方插手,情况比较复杂。开始时,一些有牵连的同志遮遮掩掩,不愿讲出真实情况;也有一些同志急于联系总后的实际;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这种情况,我曾向党委建议,首先要组织机关和所属单位很好地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按照中央和军委的部署,将群众发动起来,集中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和反军乱军的罪行,认清他们的反动实质,当时称之为揭批“四

人帮”的第一、第二战役。同时,我还认为,“四人帮”在理论上散布了种种谬论,只有从理论上划清界限,才能彻底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肃清其流毒。在此基础上,再联系总后的实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会比较顺利。我在总后党委会上多次讲过,清查工作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留隐患;二要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留后遗症。我的意见,得到了党委多数同志的支持。

1977年3月5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张宗逊部长生病期间,由我主持总后的工作。

同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党的十一大之后,我的担子重了,心里很是着急,下决心集中精力去抓揭批查工作,想尽快分清总后的路线是非,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同时全力抓好全军的后勤建设。因为当时叶帅讲过一句话,说总后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

总后确实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林彪一伙在这里干了许多坏事,仅在总后机关,他们炮制出的所谓“反党集团”、“特务集团”、“特务叛国外逃集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等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就有35个,3500多人被立案审查,其中被打死、逼死的就有143人之多。总后副部长汤平和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璋等被迫害致死。和上述问题有牵连的一些人,后来又多和“四人帮”的活动有联系。

1975年,小平同志对总后的整顿问题,有过专门指示。总后党委也曾作出决定,要调整16名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工作。刚刚行动,“四人帮”就公开插手,为这些人翻案,使问题拖了下来。我强烈地意识到,从总后的实际出发,不联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不彻底揭批林彪一伙对总后建设的破坏,就不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两者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但是,这一想法对不对?我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中央的部署,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我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有人得知我有上述想法,说我是“两箭齐发”,“另搞一套”。

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给小平同志写信,汇报总后的情况和我的想法。为什么向小平同志写信呢?因为在1977年7月间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已经恢复了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副主

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还在复出之前,6月29日,小平同志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主要是了解总后的情况。谈话间,他对总后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要求,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既要把运动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时限。要抓紧工作,把业务搞上去;要重视干部训练,加强学校领导,挑好教员,编好教材,选好学员,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最后,小平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用5年时间把军队建设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我感到,小平同志很了解总后的情况,所作的指示也很有针对性。回来后,我即向常委作了传达,研究贯彻意见。所以,我想这次也能得到他的明确指示。

1977年12月1日,我代表总后党委常委,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总后揭批查运动的情况,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建议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发动群众,把路线是非搞清楚,从而甩掉总后“老大难”的帽子。

这封信,小平同志收阅后很重视,第二天即12月2日上午就作了重要批示:“我已电话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并将我的信批转国锋(华国锋)、剑英(叶剑英)、先念(李先念)和东兴(汪东兴)同志一阅。为了不耽误工作,小平同志还让秘书王瑞林同志打来电话,表示“先这样办”。我的信,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后来也都圈阅,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批示。

有了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更增添了我做好工作的信心。我立即主持召开总后党委会,传达、学习小平同志的重要批示。大家都表示完全赞成,决心认真贯彻、落实。可以说,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平为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次年2月,中央军委又任命我为总后勤部部长。在党内,王平同志任总后党委第一书记,我为第二书记。

总后领导班子经过这次调整,党委的思想更加统一,领导力量明显加强。我们召开党委会议,分析形势,确定要继续贯彻小平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在继续抓好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

遗留的问题,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彻底摘掉总后“老大难”的帽子。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我们先后召开了4次万人大会,摆事实,讲道理,广泛宣传要把林彪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要把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问题串在一起查。同时,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对那些与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干部,根据其问题大小、态度好坏,区别对待。有的停职审查,有的停止工作、交代问题,有的暂不参加党委领导。这样,消除了群众的顾虑,有利于尽快把问题查清楚。

对于一些问题较多的单位,我们集中力量,排除干扰,扫除障碍,解决问题。比如解放军总医院,由于它的特殊性,林彪、“四人帮”都曾竭力插手,成了“文革”中的“重灾户”,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我们根据叶帅的指示,派出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副政委,带领20多人的工作组,深入总医院,查清了个别人按照林彪一伙的旨意,利用医疗手段迫害高级干部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主要问题搞清了、解决了,总医院的揭批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快就改变了形势,工作面貌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揭批查运动中,遇到的一个比较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处理总后领导班子内个别同志的问题。这位同志在我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确有错误。当时,上面对他的问题看得比较重,说他的核心问题是一屁股坐在某人一边,并且不断催我们报材料。但是,根据掌握的情况,我认为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位同志的错误,既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帮助,但又不能匆忙戴帽子、定调子,同时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干部。因而,我在总后工作期间,一直没有对他的问题作结论,经我审阅、上报的有关材料,也只是摆事实,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这样,上面曾批评我上送的材料,是“披头散发”,看不出重点。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样做对党的事业较为有利。

对于下面干部的处理,我们同样注意政策,坚持团结大多数。由于“文革”中总后的情况比较复杂,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到的干部比较多,有3000余人。我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绝大多数人,只要讲清了问题,吸取了教训,就及时予以解脱。到了运动后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只是极少数。另外,我们边清查、边调整,选拔了一批政治表现好、年富力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进入军、师两级领导班子。总后的揭批查工作,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文革”中在总后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粉碎